

停滯的當下：中國發展陷入泥沼？

評裴敏欣《跌入陷阱的中國轉軌時期：發展型專制國家的局限》*

Andrew J. Nathan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主任

翻譯／柯洛漪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部高級研究員兼主任裴敏欣認為中國的轉軌落入了陷阱。他的論據是，中國政府缺乏政治責任感、政治及管理機構軟弱無力、腐敗蔓延和壓制行為。裴氏舉證的事實正確，可它們能表明什麼？

在裴氏之前，關於鄧後時代中國發展軌道共有三種主要的理論：崩潰說、民主化說及「有彈性的威權統治」說。第一種觀點是在章家敦《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紐約，蘭登書屋，2001年）一書中明確表達的。章氏描述了裴氏舉證的大部分問題，而且還列舉了更多的例證：其中有具有顛覆性的宗教社團、少數民族的怨恨不滿、財政虧空、因入世即將到來的農業及工業就業崗位的喪失、危險且有毒害的假冒偽劣商品、欺詐的股市。他預見不滿者的一場革命起義將會推翻中共。章氏作為律師曾執業上海，他親歷了謊言、欺騙和社會墮落，感到國家再也無法像這樣繼續下去了。然而，到目前為止，中國仍依然如是。

布魯斯·吉利則提出中國必然會民主化的論點。在《中國的民主未來：它將如何發生並將走向何方》（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4年）一書中，吉利正視絕大部分裴氏和章氏所目睹的同樣難題。但是，他還考慮進去某些至關重要的資產，其中就有一

世紀之久的民主價值觀的傳統和一個龐大的新興中產階級。他像裴氏和章氏一樣，也主張目前的專制政權是與一個現代經濟社會的需要不同步的。但中共政權的對立派太軟弱，又四分五裂，也分散各地，不足以推翻它。因此，吉利根據有關民主化條件以及民主轉化路徑的社會科學理論，主張領導層及社會中的民主派在未來的領導權鬥爭中聚集在一起，使中國走上民主轉軌的道路，並在一個頗有能力的國家官僚機器的幫助下，使民主得以鞏固。

第三種理論，即有彈性的威權統治說，見黎安友發表在《民主雜誌》（*RUXUODORI 'HPRFUDU*）2003年1月號上的「中國正在變動中的衛士：威權統治的彈性活力」一文，卻比前兩者更強調中共政權的實力。這種理論並不否認中國的問題，卻指出中共在2001-2002年進行了有序的權力交接，推出一代新的有能力的技術官僚。他們宣布了要糾正諸如農民貧困及資不抵債的銀行業等問題的計劃。中共通過經濟增長、技巧嫻熟的鎮壓和宣傳，以及使民族主義的公眾揚眉吐氣的外交政策的勝利，繼續獲得民眾的支持。中共政權既沒有崩潰，也沒有民主化的跡象。裴氏貢獻了一個有價值的第四種見解。根據他的觀點，中國應朝著「一個市場經濟的和，或許有可能，某種形式的民主政策」的方向前進，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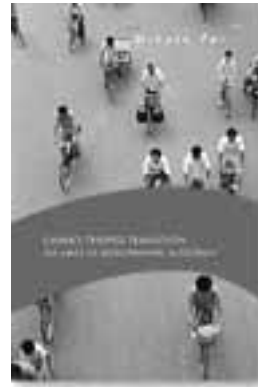
* 本文原刊於 *RUXUODORI 'HPRFUDU* 2006, vol. 85, number 4, "Present at the Stagnation: Is China's Development Stalled?"

它現在無法這樣做，因為其政治設施仍不發達。（此處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其受塞繆爾亨丁頓(Samuel Huntington)《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的影響，裴氏感謝亨丁頓的教誨及啟發。）

裴氏用了專門四章來披露鄧小平時代及鄧後時代的薄弱不足之處。談及政治改革，裴氏表明立法機構低效、司法不獨立、村級選舉極少有真正的競爭以及該政權鎮壓政治異議人士並控制互聯網。在經濟方面，他說，中國備受稱贊的漸進主義的改革已產生了一個假冒偽劣的體制，其中糧食價格不能市場化，銀行仍因政策性貸款而產生大量虧損，國有企業仍控制著關鍵部門並虧損。在國家效率方面，政府越來越龐大，越分散化，也越貪婪。財政稅收在GDP中的份額在下降，腐敗成風，有些地方的司法機關已同犯罪團夥聯手成為「黑手黨」的一部分。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該政權不能在工作場所的安全、教育、公共衛生和潔淨的環境等方面滿足公眾的需要；公眾對它的支持和擁護很弱；它面臨著農民與城市失業者的不滿。

他們有個計畫

這些都是真的，對於那些認為中國到處大興土木、出口興旺的人士來說，這是一服有用的清醒劑。但對裴氏極力強調的論點，須在兩個層面上詳盡研究。第一，我們為什麼要相信一個朝向充分市場化和民主化的轉軌就正是中國政權所要奔赴之路？鄧小平拒絕西方民主，說他僅需要能夠提升管理效率的政治改革。裴氏引用了鄧的話，但似乎更著重于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于1986-1987年為探索政治改革而成立的一個研究團體的文件彙編。我們知道這份彙編，是因為趙紫陽的一位秘書後來到了西方，並對此過程寫了一本



&KIQDV7UDSSHG7UDQMMRO
7KH / IP IW RI ' HYHRS P HQMO
\$XVRFUDF
By Minxin Pei
(Harvard Univ. Press, 2006)

書。這個研究團體聽到了一些激進的主張，若其得以推行，有可能真正使中國民主化。我們並不知道趙紫陽本人對這些主張有多麼強烈的興趣。無論如何，趙在1987年中共13大上有關政治改革的提議是溫和的。天安門事件和蘇聯崩潰接踵而至，使掌權的領導人（不再包括趙紫陽）猛醒，必須牢牢握權、嚴加控制。沒有證據表明，江澤民或胡錦濤的政治局中有誰真正傾心於這些有可能讓黨外人士向其權力挑戰的改革。

總而言之，依我之見，裴氏心目中「仍在孕育」的政治改革，絕不會超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提高管理水平、控制下的協商程序之類。經濟改革亦是如此。裴氏在書中第三章所使用的「充分市場化」這個概念（極少或沒有國家對價格的控制，甚至在戰略性產業中極少或沒有國家的壟斷，在銀行的信貸活動中極少或沒有政策性干預）從來就沒有實現過，因為它從來就不是中共打算想要的東西的一部分。而且，像朱鎔基、溫家寶之類的經濟改革家，是想通過讓中國經濟有控制地在國內外市場力量中經風雨、見世面，從而產生一個少而精、更有競爭力，於是也更強大的國有經濟。國內外市場力量對中國的影響，是由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專業的國家調控機構所緊緊控制著的。因此，當大部分價格開放之時，關鍵商品和因素（諸如能源、鐵路運輸，還有如裴氏所指出的，勞動力、

房地產和信貸)的價格並沒有放開。當成千上萬家弱小的國有企業倒閉或私有化之時，一千家左右最強也最具戰略意義的國有企業被挑選出來，按其需要得到國家的幫助，使之生存、生長和興旺。當有些國有銀行被允許讓國外銀行購買其少量股份之時，銀行仍是國家所有，並繼續支持國有支柱企業和國家優先的基礎設施投資。

一句話，中共政權在政治上或在經濟上，從來也不打算無所作為、坐等全球化把它沖垮。當然，有人會說該政權的如意算盤是誤入歧途的，因為它與西方關於市場化和民主的不可避免性的社會科學理論相矛盾。可能如此。但這正是中國嘗試的生死存亡攸關之處。從哈薩克斯坦到伊朗的專制政權們正在關注：中國是否能證明一個專制政權可以通過現代化來繁榮興旺。像落入陷阱的轉軌或部分轉軌的這樣見解，意指我們應該承認的一種目的論，但它並不被舞台上主角們所分享。

裴氏論點的第二個問題，比較不那麼有理論色彩，而更與事情的來龍去脈有關。裴氏列舉的事實是無誤的，但它們並不構成有關中國實情的一幅全景。或許誰也無法在一篇宏論中就囊括像中國這麼一個巨大國家的錯綜複雜性和種種矛盾。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全盤否定的見解都忽視了中國正在糾正的許多事情。比如，中共政權宣布取消了把農民圈在農村不得問津城市的工作及優惠政策的戶籍制度、取締了隨意扣押城中暫住者的「拘押收容所」、終結了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農業稅，它還打算把經濟增長的動力更多地從出口轉向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溫家寶總理最近宣布了計劃，要為一至九年級的學生提供義務教育、改善農村的醫療條件，並加強對農村土地權利的保護。

和中國的一貫做法一樣，任何新的改革都只是部分的，美好的口號難以得到兌現。

各地的地方抵制、官僚機構的反對，再加上資金匱乏使得執行緩慢，有時完全失敗。然而，我們的懷疑應有節制。這些新宣布的改革提供了一種政策的創新，在三十年的期間內已產生了實實在在的成效。當然，它正如投資公司所言，過去的業績並不能保證未來的實效。但最近宣布的改革確實至少表明了，中共政權已經知道其正在變動的社會中的嚴峻局面，知道了它自己在治理中的缺陷，並正在採取步驟去糾正失誤——至於成功與否，則只有時間才能驗證。

裴氏研究的本身確實就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在證實著這個事實。他用來告訴我們中國面臨的難題的來源，絕大部分出自中共政權自己的媒體和研究部門。裴氏關於腐敗和機構軟弱無能的消息，部分來自黨的內部報告，但大部分源於公開發行的中國報紙、經濟雜誌、國家計委報告、國家統計年鑑、社會科學機構的民意調查（裴氏應告誡讀者，這些調查的採樣技術極少能達到科學的標準），源於中國新聞網和官方新華通訊社的網站。

裴氏在梳理這些信息來源時下了一番功夫。但我們也需要深思一點，這些來源為中共政權的病情提供了如此豐富的信息一事意味著什麼。中國的媒體和研究機構仍是國家或黨所有的並受其指導。它們以日益加強的自治力在運作，只要在黨的指導框架之內就行。一旦越規，記者或學者被開除，有時還要坐牢，出版物或機構被關閉。是否記者和學人大量地離心離德，該政權審查不及，無法防止他們發表大量負面的消息？更有可能的是，宣傳當局使用這種報導和研究的渠道，來收集新發生問題的信息，以警告幹部們改善其作為，向公眾表明黨正在為代表他們的利益而工作。與中共政權的其他政治策略一樣，這些舉措是否有效，還有待時日證明。但同時我們應得出結論，中共政權正在積極

糾正裴氏所看到的這些問題，因為它本身也看到了。

中國社會確實已經變得更加動蕩不安，但是這也不能片面證明事情正在分崩離析。像愛滋病和環境這類迫切的非政府組織問題，法律救助辦公室幫助民工起訴企業和政府機關，退休人員和失業工人向黨的機關上訴，新聞記者用礦難和強迫徵地的調查詰難地方官員——這些力量給中國的各級官員造成挑戰，但是它們是在威脅政權，還是在鞏固政權？或許說什麼都還為時過早。但是，提出問題是在提醒人們，任何政權都是一座錯綜複雜的多層建築，中央當局的利益並不總是和腐敗無能的地方官員甚至高層官員的利益一致的。社會不滿情緒在壓抑過久之後一旦冒出表面，可能頗為嚇人，但是它也可能有益於政權的生存利益，問題就看是如何處置了。

接下來呢？

依我之見，最要緊的是，裴氏忽視了我視之為今日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因素，黨中央精英的權力和團結。專制體制的命運與其說是由其社會來決定，還不如說是由其自身來定。如果其核心領袖團結一致，有自信，並保有軍隊和警察的支持，它們就能倖存。西方分析人士和中方分析人士一直在掃瞄因權力之爭或原則之爭而進行派系鬥爭的跡象。但迄今為止，我們還未見到胡錦濤治下有這類鬥爭在實際發生。

當然，政治不會是一潭死水。除了布魯斯·吉利之外，其他三種理論在預測下一個轉折時都做得不好。吉利預見民主轉軌成功，民主政體鞏固了自身，社會安定，世界和平，皆大歡喜。在章氏的理論中，不清楚下一步會發生什麼——民主化？新的專制政權？有彈性的威權統治一說，要靠順應潮流的漸進

主義的步伐何時積累至該政權的變質。裴氏關於中國如何跳出轉軌陷阱的主張包括民主化（他擔心此舉會失控，導致社會震蕩）、政權崩潰，或「大權旁落」，即他似乎是指中國部分地、事實上的分崩成各地的自治，各自摸索嘗試不同的政治經濟模式。

不管怎麼說，即使是對目前各種力量的相互關係進行最精明的分析，要想預測變動的方向也只是一種幻想。歷史中的實際變動——中國當然如此，或許到處都是一樣——時常是反意的。不管人們認為中國今日正在發生著什麼——崩潰、民主化、有彈性活力，或是停滯——人們仍應該問一下什麼會使那種進程出軌。可能改變目前趨勢方向的事件多不勝數，有兩種答案湧上心頭：美國經濟的劇弱，它會毀掉許多中國人的生計，撕破中共與其社會之間的社會契約；還有則是台海戰爭，這場戰爭視其進程和結局來定，會重新攪亂中國內部以及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利益和態度。再想得多一些，不定因素還有朝鮮半島的戰爭，以及應對失措的流行病。有可能對中國政治體制造成衝擊的外部因素的簡短名單，提醒我們記住我們已知的某件事，那就是中國的和我們自己的未來之間已經發展出的那種密切的相互依賴。

我們對中國未來的影響很可能是邊沿性的，但有意義的是要沈思我們似乎對自己樂於見到的中國未來的那種既愛又恨的矛盾心態是何等強烈。民主、繁榮、安定、自由、法治——如果好事都聚在一起，那就沒有什麼困難的抉擇可做了。但既然變革有風險，美國的政策似乎要兩面開弓——既要維持我們熟知的這個政權，雖然其專制體制是個事實，又要推動其改革，使之變得更加民主。據說中國領導人很擔心美國是否樂於見到中國發生一場「顏色革命」。在此點上，答案應是我們自己也不知道。